正根基 明方向 守底线

李文朝

一段时期以来，文艺界特别是娱乐圈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问题及不良粉丝文化乱象，引发了社会与公众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批评。文学工作者也应该引以为戒，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上下力气、见实效，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作积极引领社会风尚的表率。为此，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正根基。

透过不良粉丝文化乱象的种种表象看其本质，我们不难发现，文艺界个别违法失德者的问题症结，恰恰是因为在“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他们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去创作，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炒作，圈粉丝，争流量，追名气，逐利益。圈子越炒越热，头脑也越来越热，以致忘却了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铸成违法失德之过，教训极为深刻。我们文学工作者应该切实引以为戒，修身守正，立心铸魂，特别在“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立正根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学工作者要承担培根铸魂的神圣职责，首先自己要正根净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尊自爱，自律自重，特别在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创作的立足点上，要立正站稳，这是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强基固本工程。

二是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警示大家，“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并尖锐地列举出“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等不良现象。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文学工作者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客观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作品要考虑经济效益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更不可颠倒。

因此，文学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做到坚定清醒，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不迷失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切实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绽放自己的艺术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是守底线。

任何作家、艺术家，其最基础、最原本的身份，就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国度、特定社会制度下的自然人。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民族的道德公理，是其必须遵守的法度底线。文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自然人，其职业道德建设，最基础、最原本的一点，也正是要守住相应的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

职业道德建设，说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行动问题。对于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这些显而易见的是非曲直，许多人并不是不懂不知，而是故意为之。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知情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作者本人。他们在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其社会效益是什么，经济效益在哪里，作者本人最清楚。之所以出现一些“骂祖求名”“败俗谋利”的作品，就是作者为利益所驱使，在做人的道德底线上失守失控。“不怕骂声起，只求金钱来”，正是他们扭曲的心灵写照。

可见，文学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守住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为守住了道德底线，当自己萌生见利忘义的创作冲动时，道德底线思维有助于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坚守道德底线，最根本的还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身觉悟，强化责任担当，做到积极引领社会风尚，自觉坚守艺术理想。

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突破

——王琦小说《小城槐香》之我见

韩进

王琦自传性小说《小城槐香》(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其独特的童年视角、纯真的儿童情感、丰厚的主题意蕴、柔美的抒情语言、精巧的艺术构思，塑造了以女儿小青子为代表的小学生形象和以妈妈梅老师为代表的成人形象，在“成人—儿童”的世界里，再现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作者以历尽风霜的槐树象征小青子坚韧向上的性格，以自然醇香的槐花赋予梅老师默默奉献的品质，讴歌“生命中的树”，回归儿童文学本质，为童年题材小说创作带来新突破。

小说突破了儿童狭小的生活空间，将孩子的命运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里，从儿童视角透视儿童被社会化进程，塑造了小青子纯真、善良、坚韧、阳光的儿童形象，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王琦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多年。作品中小城的原型即作者童年生活的古城太原，主人公小青子就是童年时代的作者。小说讲述了国师中学教师宿舍院一群十一二岁孩子的成长故事，主要情节是发生在小青子身上的“公共事件”：小学五年级的小青子参加初中举办的跳级入学考试，以优异成绩插班进入初中一年级学习，并且担任了班干部。正当小青子融入班级、专心学习的时候，教育局文件取消跳级考试结果，要求小青子等插班上学的同学回到原来的小学，插班六年级学习并参加即将举行的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小青子在家人、老师、同学的关心鼓励下，发奋读书，终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小城最好的中学。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件？这是小青子的疑问，也是读者的追问。其实作者在第一章就埋好了伏笔，在一段看似漫不经心的人物关系交代里，为小说情节推进和人物命运的展开设置了必然的社会环境。小说详细描写了教师宿舍院内的布局，在不动声色的介绍里，写出了院内住户的不同“级别”。在住房是社会地位绝对象征的年代，人们之间的交往也自然而然地形成各自心照不宣的“级别”，自然而然地将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划分到不同的班级。一班是可以直升初中读书的实验班，班上同学的家长不是国师中学的年级组长，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医。而小青子和土豆的妈妈都是国师中学的普通老师，他们还被同学们称为“没有爸爸的孩子”(爸爸都在外地工作)，他们一起上普通班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儿童社会是成人社会的缩影，邻里关系是儿童最初的社会关系。作者直指儿童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等级观念和特权行为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儿童受教育的公平权利。《小城槐香》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既来自作者的童年体验，又反映了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不可分这一中国特色，为观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现象提供了新视点。

小说突破了童年题材的时空维度，将童年的情形放到人生的长河里，从成人视角回望童年，讲述逆境中成长的励志故事，塑造了以梅老师为代表的成人形象，体现了儿童本位与成人引导相结合的教育理念。童年是人生的起点，回望童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对小青子成长影响最大的是她的妈妈梅老师，妈妈身上所拥有的勤劳善良的品质、奉献担当的精神、贤惠乐观的美德，都在小青子身上得到传承。特别是以妈妈为代表的成人集体，面对孩子遭受重大挫折，既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去理解孩子，又要站在成人的立场去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走出困境，使得他们的心灵和人格都得到成长。这种挫折教育的实践对今天的儿童成长教育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小说第四章《冬天，也是春天》讲述小青子被退学的故事，既将小说情节推向高潮，又是小青子的情感低谷。小青子身边的大人们没有当面抱怨，而是在“春天般的温暖”里，帮助她树立自信，勇敢面对，让挫折成为人生的精神财富。化解成长危机以后，小青子得到了真正的成长。

小说突破了儿童小说的故事模式，将儿童的成长放到特定的小城里，讲述人与树的情感故事，以诗意般的散文语言，礼赞“生命中的树”，有着浓郁的抒情风格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槐树作为小城特有的树，已经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树，而是小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见证，是小城之魂，是小城人的精神象征，更是小青子“生命中的树”。在小青子心里，槐树不仅是坚强的“爸爸树”、有香味的“妈妈树”，更是自己的生命树，它那么“静静地伫立着”，就像是在陪伴并守护她成长。作者王琦借助文学的力量，在《小城槐香》中与童年的小青子相遇，就是期待能够有更多新时代的“小青子”出现，将坚韧勇敢和谦逊宽厚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

从《理想之城》的得失看文学思考与实践

戴清

《理想之城》剧照

《理想之城》是近期播出的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职场剧。和同期播出的其他剧相比，它既没有涉案剧紧张激烈，也缺少家庭伦理剧的温婉细腻，却揭示了更加常态化的现实生活，时代感、都市感、职场感沉实绵密。

职场剧一直是国产现实题材剧的创作短板。这一状况即使在一些专业色彩很强的热播剧，如《外科风云》《精英律师》《幕后之王》等作品中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此情形下，《理想之城》的出现与得失就更值得重视。

人物塑造特色鲜明

当下剧集市场以女性观众为主体，这也让“女性题材”创作容易讨巧，而有些作品刻意迎合女性观众，多少影响了作品的人物定位、人物关系、文化观念甚至是价值取向。

《理想之城》在创作观念上努力打破刻板套路，从原小说《苏筱的战争》到现剧名的变化即能反映主创对作品的定位。作为新上海人，苏筱的奋斗靠的是个人过硬的专业能力。她的出场决不光鲜，职场失败、情场失意，连职场通行证——造价师证都被情敌扣押。然而，越是处境艰难，越能表现出人物的坚韧个性。美术馆项目她以通宵达旦、连续作战的韧劲完成了优秀标书，一举战胜能力超群的男主夏明。苏筱从一个凡事较真儿、单纯干净、却缺乏全局观与适度变通的职场菜鸟，到逐渐明了“成熟的麦穗懂得低头”，再到能够忍辱负重主持推进集团改革。苏筱的成长不只是职场权位的升迁，更重要的是她的心性、胸襟、情怀与境界的提升与进步。

人物塑造的成功，还体现在该剧人物群像中几乎没有纯粹功能性的工具人或过场人物。很多人物看似普通，其实都有其特色与意味，也因表演上乘，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谓“理想之城”，也是一幅赢海高管们的职场现形记，从中道出了集团守成之艰、发展创新与人才迭代之难，有着丰富的思想启示价值。高管有共同利益，但更有本位利益，文化程度、性格差异也甚大。徐知平位高权重、善于制衡，有大局观、以集团利益为重；这就与精明能干却私欲膨胀的汪明宇形成鲜明对照；黄礼林粗鲁江湖、势利直接，但对外甥夏明却全心呵护；汪炀和黄礼林一样文化不高，但宽容耿直、知人善任，同时惰性大、得过且过，与黄礼林判然有别。再如地产老总林小民，本位意识强，善于周旋，正是赵显坤批评的“我字当头”，其他如副总经济师赵鹏则是处心积虑、与汪明宇同属结党营私的一类人；而人事总监玛丽亚英文不离口，处处显示其海归身份，有矫揉造作的一面，但她规则意识很强，同时也有善于变通、及时调整姿态的聪慧……高管层的各色人等尽皆亮相表现，群像戏格局开阔、耐人寻味，其魅力远超单一的“大女主”与“情感戏”。

现实思考有待提升

必须指出的是，《理想之城》的创作仍然留存着一丝犹疑气息，也标定了该剧从“伪职场剧”“悬浮职场剧”向“真职场剧”的进化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过渡期的某些特征。

具体来说，首先体现在与苏筱形成对照的吴红玫这一人物身上。吴红玫是典型的小镇青年，没有“美强”只有“惨”和普通，剧中一再渲染其衣着装扮、被玛丽亚嫌弃、生活困窘等尴尬状态，丈夫小北平庸、不上进、抠门儿，总之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有真实生活的基础的。但在作品接近结尾时，为了让董事长赵显坤与红玫之间来电，竟让一个年过半百的商场精英“失能”到连鞋带都不会系了。这样的审美表现就又折回到之前的老套路上了，霸总不爱美丽能干的苏筱，却喜欢烧一手好菜、不争不抢的红玫，多少透露了编剧对女性成长与独立的犹疑态度。

其次，创作者给予苏筱这位“理想之城”的坚守者、理想主义化身的助力是全方位的，越到后面越给人以过于幸运之感。试想在建筑这样的传统行业里，短短两年中就做到集团副总经济师是多么小的概率。接近结尾时，苏筱更是肩负起开启子公司合并、全员持股的集团改革，专业跨界之大、责任之重都令人叹为观止。现实题材需要理想主义光芒的灼照，但过亮的光芒有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可信度。

再者，作品聚焦赢海集团内部的竞争竞标的笔墨较多，但对行业竞争、社会问题的表现却较少，也就无法对集团为什么遭遇发展瓶颈、各个子公司何以无一例外地面临经营不善这些问题提供深刻而可信的解释。同时，作品最终给出的全员持股的改革方案确实有现实中的样板，但也并不像想象的那般简单易行。员工股权与年资、身份、级别、个人贡献等如何挂钩及分配一向是个复杂工程，恰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需要有思想发现与精神灼照，真职场剧作为现实题材剧的组成部分也需要对社会生活、职场运行有真正的思考与洞见，才能有建立在此坚实基础上的审美发现、提升与表达。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写作的境界

贾平凹

1.文笔太顺溜了就要让它涩一点，有时得憨憨地用词。

2.现在有一种风气，行文幽默调侃，但太过卖弄了就显得贫和痞，如果这样一旦成了习惯，作品的味道就变了。

3.有些事不要太使聪明才情，要养大拙，要学会愚笨。平日说话，大家都不屑夸夸其谈，古语道：口锐者天钝之。写文章也是说话，道理是一样的。

4.在大的背景下写你的小故事，从人生中体悟了什么，仅有深意藏矣即可，然后就写生活，写你练达的人事。写作同任何事情一样都要的是过程，过程要扎实，扎实需要细节，不动声色地写，稳住气写，越急的地方越不能急，别人可能不写或少写的地方你就去写和多写，越写得扎实，整个结果就越可能虚，也就是说，作品的境界就大。反之，境界会小。

5.不要再讲究语言和小情趣。要往大处写，要多读读雄浑沉郁的作品，如鲁迅的，司马迁的，托尔斯泰的，把气往大鼓，把器往大做，宁粗粝，不要玲珑。做大袍子了，不要在大袍子上追究小褶皱和花边。

6.关注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才可能更本真，更灵敏，也更对现实发展有着前瞻性，也才能写出我们内心的欢乐、悲伤、自在或恐惧。作品的张力常常在于和社会的紧张感，也可以说，作家容易和社会发生一些摩擦，这不是别的，是写作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

7.我主张脚踏在地上，写出生活的鲜活状态。这种鲜活并不是就事论事，虚实关系处理好，其中若有诗性的东西，能让生命从所写的人与事中透出来，写得越实，作品的境界才能越虚，或称作广大。

名家谈艺

巴金的“禁区”

崔鹤同

1980年，一位编辑约萧乾写一篇关于巴金的回忆文章。萧乾首先想到巴金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把十几名学生从宿舍抓走。在校务会议上，他这位老友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1949年，巴金的这位朋友，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不幸与世长辞，他的夫人早已于1938年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孩子。听说这一对孩子当年曾受过巴金一家的照顾。

萧乾写信给他较熟的那个女孩(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希望了解一些这事的细节。万没想到，萧乾碰了个硬钉子。她回信说：

萧叔叔：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巴金本名李尧棠)，就像爱自己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报刊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看完这封短信，萧乾大为失望，他知道，这是巴金的“禁区”。这使萧乾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得萧乾讲过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就想请萧乾把它写出来。但萧乾知道巴金不愿别人提及此事，他要写，必须先过巴金这一关。于是，他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希望新一代编辑们能及时并认真地看一切来稿。这样，巴金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曹禺本名万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通过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横空出世，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奠定了曹禺现代话剧开山鼻祖的地位。

杜剑君(古交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杨斌 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yb@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